

文 革 回 憶 錄 叢 書

親歷

重慶大武門

——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

李木森 回憶
何 蜀 整理、註釋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 革 回 憶 錄 叢 書

D652
32

親歷

重慶大武門

李木森 回憶
何 蜀 整理、註釋

——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



SEU 06681911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回憶錄叢書

親歷重慶大武鬥

——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

李木森 回憶

何 蜀 整理、註釋

責任編輯：柳 陽

封面設計：胡 冬

ISBN 978-988-19703-4-3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1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11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8 5333

發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地下

G/F,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 00852-23818251

Fax: 00852-23971519

定價：HK\$ 80 元

爲文革研究填補空白

——《親歷重慶大武鬥》序

壬午年一

本書的整理者何蜀，是我的老友，好友，合作寫作的夥伴。我們合作撰寫文革研究文章多年，雙方都很愉快。何蜀潛心研究文革中各地的群眾組織，造反派代表人物，前不久才寫成《論造反派》一文請我提意見，現在又送來這部《親歷重慶大武鬥》書稿，我拿到書稿時正值狗年春節前夕，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初二我都在讀，讀完後感觸很多。我認爲這本書填補了文革研究的空白。

文革研究專家，大致有兩類：一類姑且稱之爲“眼睛向上”派，一類則爲“眼睛向下”派。“向上”派注重研究毛澤東、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等高層領導人及其相互關係，研究文革的發生與發展，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他們多作宏觀的研究；“向下”派則注重研究中國的老百姓，研究廣大的青少年，研究上層的舉措在下層的反響，等等，他們多作微觀的研究，日常生活的研究。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現在做上層的研究越來越困難，人爲的阻力不小。下層的研究，禁忌相對較少，人們對下層研究的重要性也比過去更清楚，因此下層的研究也日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當然，以上只是“大而化之”的說法。也有不少研究難以歸入“向上”與“向下”之中。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十五位文化名家回憶文革的文章的合集《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上下二冊），就難說是“向上”或“向

下”了。這樣的例子很多。何蜀兄早就有志于研究下層的問題，他整理的這部書稿可謂“眼睛向下”的難得之作。

重慶大武鬥，聞名遐邇。人們常說，文革中首例大規模武鬥是上海“康平路事件”（造反派“工總司”鎮壓保守派“赤衛隊”的大規模武鬥事件），其實不然。經老何考證，全國首例大規模武鬥事件發生在1966年12月4日的重慶，較上海“康平路事件”要早近一個月。至于造反派兩大派之間的大規模武鬥，重慶就更是獨具特色了。重慶是造槍造炮的軍工廠比較密集的地方，武鬥起來使用真槍真炮，使用大口徑榴彈炮，使用當時最新式的槍炮，與軍隊打仗沒有多大的不同。殺人一千，自傷八百，鮮血淋漓，丟下不少孤兒寡婦。雙方還槍殺俘虜……重慶武鬥規模之大，使用武器之現代化，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之慘重，都是觸目驚心的。重慶本來有好些武鬥死者（當年都各自稱為“烈士”）墓地，可作為文革浩劫的歷史見證，後來因“淡化文革”，多已遭到不留痕迹的毀壞，如今只殘存著沙坪壩公園中的一處，還不時聽說要面臨被“開發”的命運。

本書由重慶兩大派中的一派的“一號勤務員”李木森回憶，詳細敘述了一次又一次武鬥的起因、經過與後果，可以看作是《重慶武鬥史》。李木森誠實地說，江青肯定河南一群衆組織提出的“文攻武衛”口號的講話，對他們影響不大。我也認為，異常複雜的社會現實，不能歸因于某個人的一句話。李木森本是一個好青年（出身貧苦，“根紅苗正”，共青團員，做技術工作），何以成為大武鬥的指揮者（“戰區司令”），李木森講得清清楚楚，沒有說教，沒有廢話，一切都是那麼自然，那麼“水到渠成”，李木森當上了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相當于現在的副市長），又如何從“當官”到“丟官”，如何經歷了十年的“揭、批、查”，經歷了十年的審查，又如何回歸工廠技術人員的本色，連續獲得先進生產者等諸多榮譽稱號……這些都回憶得明明白白。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風浪接一

個風浪，一個事件接一個事件，一場武鬥接一場武鬥，在本書中都得到了生動而真切的體現。

重慶武鬥是全國武鬥的典型，李木森是武鬥指揮者的典型，抓住這個典型，記錄、整理出這部回憶錄，很有價值，在許多方面爲研究文革提供了原始的資料，李木森出身好，有文化，有思想，觀點不偏頗，是文革研究的好對象。本書內容嚴肅，註釋詳盡，不妨看作是《重慶文革史》。

本書是對紀念文革爆發四十週年的最好的獻禮！我們大家，無論是當政者還是平民百姓，都可從中獲得很多教益。

這本書做了個好樣子。願這股“眼睛向下”的好風氣得到發揚，每個人都可以想想、寫寫“我在‘文革’中”。

丙戌年新年寫于北京西郊

序

余汝信

武鬥，是文革期間中國大地上的普遍現象，而以公認的說法，文革武鬥之冠，首推西南山城重慶。數年前，一篇《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鬥》，將人們帶進了重慶沙坪壩公園內的荒草雜木叢中。那兒保留著一片全國“碩果僅存”的武鬥死難者墓地，一座座年久失修、殘缺不全的墓碑，仿佛在感性地向偶爾來到的訪客，訴說著當年子彈呼嘯、血肉橫飛的慘烈景象。今天，這一冊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的《親歷重慶大武鬥》，更以平實而又詳盡的筆觸，從一個武鬥參與者、指揮者的角度，再次把我們帶回那一場場硝烟彌漫的“特殊內戰”。

1966年，李木森二十八歲，是位於重慶江北區大石壩的國營江陵機器廠技術科的一名普通技術員。所謂國營江陵機器廠，是生產小口徑炮彈的五機部152廠的對外第二廠名。由於歷史的原因，類似江陵廠這樣的國防軍工企業在重慶為數眾多。其發展過程大略經歷了兩個重要階段，一為抗戰爆發後大量兵工廠的內遷，如江陵廠的前身，就是前國民政府兵工署第十兵工廠；二為1960年代中期的三綫建設，規劃以重慶為中心，將該地區打造為中國最具規模的常規兵器生產基地。

除李木森所在的江陵廠外，本書多次提及的建設機床廠（296廠）、長安機器製造廠（456廠）、長江電工廠（791廠）、望江機器製造廠（497廠）、重慶空氣壓縮機廠（256廠）、嘉陵機器廠（451廠），均為重慶地區的常規兵器生產大廠。文革

狂飈席捲之下，這些本來紀律嚴明、處於嚴格保密狀態的軍工“編號廠”內，突然分成了勢不兩立的對立派系，雙方各自又掌握了本應嚴格管制的門類齊全的殺傷性熱兵器，這恐怕就是重慶地區武鬥的規模能在全國稱魁的主要成因。

根據本書記述，重慶工人隊伍中保守派勢力并非強盛，至1967年初即已基本式微。大規模武鬥主要是在造反派中裂變出來的兩大派系——“八一五”與“反到底”之間進行。國防軍工系統中，建設、長安、江陵、望江四廠以“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佔優勢，空壓、長江、嘉陵、無綫電（四機部716廠）則以“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團稱雄。用以裝備正規部隊的武器一旦輕易落入群眾武鬥隊伍之手，後果的嚴重性自然可想而知。據有關官方資料稱：重慶武鬥就是以槍炮工廠為首，武鬥中從步槍到機槍，從大炮到坦克，凡是重慶地區能夠製造的武器，幾乎都動用了，建設、長安、望江等幾個大型槍炮廠，成了武鬥的軍火庫、指揮部和武鬥爭奪點，建設機床廠動用了上萬支半自動步槍并散發到全川各區、縣，該廠的武鬥造成了職工和家屬九十餘人死亡，上萬平方米的一棟大樓被付之一炬。

文革改變了李木森的人生軌迹，他從一個普通技術員，而至重慶軍工井岡山總部、重慶工總司的勤務組組長，再進而為“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總勤務組組長，成為“反到底”派的主要負責人，武鬥的主要指揮者。我們未能得知李木森到底有何過人能耐，不過，在1967年間武鬥最熾烈時，他的確擁有了“反到底”一派的最大話語權。

惟從本質上說，李木森并非武鬥的狂熱愛好者。據其本人的說法，他對武鬥的態度，內心一直是矛盾的。武鬥越打越大，打得當頭頭的都有點騎虎難下。李木森曾暗自想過：下一步怎麼辦？還繼續打下去嗎？但又不能隨便停下來，主動停下來，“因為我們要停下來了，對方不停，那不是等著挨打嗎？”這些話，應該視為其肺腑之言。

重慶武鬥最終得以停頓下來，兩派紛爭走向緩和平息，經歷了年許漫長曲折的過程。軍隊，尤其是野戰軍，在此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軍部駐重慶的陸軍第五十四軍自1967年1月即介入重慶文革。從實際情況看，五十四軍一直在制止武鬥而始終未能奏效。但中央畢竟還得依靠軍隊。196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內稱：“應當實事求是地估計和對待重慶警備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錯誤，應該看到，他們在這些工作中，是有顯著成績的。”所謂“重慶警備司令部”，並不是一個實體，它實際由五十四軍兼任，換言之，重慶警司即指五十四軍。

該《意見》還稱：“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由當地駐軍副政委藍亦農同志、副軍長白斌同志、重慶軍分區司令員唐興盛同志等負責組織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藍亦農同志為組長，白斌同志為副組長”。所謂“當地駐軍”，實際上指的亦是五十四軍。這一紙《意見》，奠定了五十四軍在解決重慶問題上的無可替代的主導地位。

同年5月27日，毛澤東代軍委起草的“轉發五十四軍對反對派進行工作情況報告的批語”稱：“五十四軍在重慶做得不錯，可供你們參考。凡屬兩派革命群眾組織互相對立很嚴重的，只要進行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對於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反動組織，也要細緻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此批語無疑被五十四軍視為手中的尚方寶劍。然而，在“反到底”派看來，五十四軍雖說是兩派調停人、裁判者的角色，但更多的似乎是站在“八一五”一邊，故此，雖則有此“最高指示”，“反到底”對五十四軍仍不大買賬。

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毛澤東終於下決心由亂到治。8月，中央調查組抵達重慶，在調查組及五十四軍的監管壓力之下，月底，重慶兩大派進行了停戰談判，9月1日，

達成《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第一號協議》。再經大半年的反反復復，重慶大局底定。翌年6月2日，重慶市革委會成立，時已升任五十四軍政委的藍亦農，任市革委會主任。

據五十四軍軍史稱，自1967年至1968年，該軍一三〇師在成都市，雅安、樂山專區，宣賓、瀘州市以及夾江、犍爲、彭縣；一三四師在南充市，南充、萬縣、達縣、綿陽專區；一三五師在重慶市，江津、宜賓專區以及瀘州市；軍直在重慶市，潼南、合川和大足縣等地，共十一個專區（市）、四十餘個縣的二千一百多個點上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其間，軍政治部幹部處處長張甲奎、一三四師四〇二團後勤處政治協理員馬忠臣和五連戰士何能文等十六位幹部戰士“爲制止武鬥而犧牲”。

1968年10月，奉軍委命令，五十四軍由川東調防滇西，川東地區的防務和“三支兩軍”，由陸軍第十三軍接替。十三軍抵達川東後，軍部駐重慶市并兼重慶警司，原由藍亦農擔任的重慶市革委會主任一職，由十三軍政委段思英接任。十三軍與原重慶兩派均無任何瓜葛，處理兩派問題更爲得心應手一些，這與兩軍調防的初衷是相一致的。

無論造反派感情上接受不接受，制止武鬥、平定大局的責任，歷史性地落在以野戰軍爲代表的軍隊身上。也不管李木森們願意不願意，重慶以至整個川東地區的話語權，轉移到了五十四軍及續後的十三軍手上。軍隊本來并不熟悉地方事務，軍隊介入地方文革，亦必然會帶來衆多弊病，而在當時的情形下，却唯有此策，別無它途。

李木森本人在重慶市革委會成立之日，坐上了主席臺，以一派群眾組織代表的身份，當上了“三結合”的市革委會副主任。據說，他這位副主任并無明確的分管工作，他心裏也很明白：實際掌權的，是主任、副主任中的軍隊、革幹代表。此後直到1977年5月宣佈其回廠接受審查的九年間，這位群眾組

織代表不斷被邊緣化。

本書是回憶者與整理者密切配合、良性互動的結晶。

縱觀全書，可以發現，李木森回溯往事時的心態尚算平和，且記憶力甚佳。對重慶兩大派武鬥的緣起、激化過程，矛盾衝突的詳情，敘述得有條有理，綫索分明，脈絡清晰。作為全書的中心部分——武鬥的經過使人看得如臨其境，唯一可遺憾處，只是後來非中心的枝蔓，應還可再減削一些。

作為個人的回憶文字，尤其是文革中某一派別頭面人物的回憶文字，人們很自然會僅將其視為一家之言，實際上，書中的某些個別處不可避免地亦會有失偏頗。但這些都不要緊，沒有任何回憶文字是沒有傾向性的，只要已經將自己所經歷的原原本本交予了讀者，也就盡責了。別人說你是一家之言，也不打緊。沒有千百條小溪，何來巨川長河？類似本書這樣的個人回憶文字積聚起來，相信定會成就地方文革史的鴻篇巨製。

然而，記憶力再強，因相距事件發生時日已有相當一段距離，怎麼也免不了有失準確或誤記之處。對原始回憶素材進行考訂修正就顯得十分必要。本書註釋的密度很高，可以相信，整理者為此傾注過大量的心血。這些註解頗為準確到位，如對陷入兩派紛爭的國防軍工大廠簡要背景情況的介紹，對參與地方“三支兩軍”的軍隊領導、參與“三結合”的地方幹部的介紹，等等。尤其不能不提及的是本書對當地兩派群眾組織頭面人物的介紹之詳，相信在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尚難以有人可以企及。這也說明整理者確實是下了大功夫的。

考證、註釋對回憶錄正文起著扶持、佐證的正面作用。光有回憶文字，沒有這些讀者可以直觀見到的詳細註釋及背後看不到的大量嚴肅、認真、細緻的考訂工作，回憶錄只能算是半成品。而正因為有了這些後期加工，相信本書堪稱地方文革史料和回憶史料雙重意義上的精粹。

二〇〇六年四月

目 錄

王年一序：爲文革研究填補空白	1
余汝信序	4
前 言	1
第一章 我的“勤工儉學”生涯	3
五歲開始拾破爛	3
我只想她能多買我的糖	5
第一次收到人民幣	6
賣柴與賣菜	7
我們的戊班	8
第一次聽大官作報告	10
第二章 從中專生到技術骨幹	12
我編了一條“理論”	12
我的委員工作	14
提前結束實習期	15
軍工廠也“大煉鋼鐵”	16
參加尖端產品研製	17
十八斤糧票成了廢紙	19
用筷子秤平息飯菜風波	21
給車間解決了大難題	22
壓鑄模設計作貢獻	24
滿腔熱情唱呀跳	25
第三章 從造反到砸革聯會	27

不讓重大八一五過河	27
“排隊”名單引出造反“尖刀”	29
成立軍工造反兵團	32
革聯會成立大會上慘遭意外	37
我們被推到反革聯會一邊	41
周榮與重大八一五辯論	42
我被揪上了批鬥臺	45
歡呼“紅五條”	48
第四章 在“全面內戰”的炮火中	51
我怎樣當上軍工井岡山總部一號勤務員	51
轟動山城的《公函》與《復函》	54
我又成了工總司一號勤務員	58
望江廠阻軍事件	60
軍工井岡山總部決定發槍自衛	65
軍工“三巨頭”秘密會議	70
史無前例的“土炮”	71
選擇炮位遇險	74
兩打十八中	77
嘉陵廠請求支援	80
向八一五的“生日”“獻禮”	83
江陵廠遭到重大八一五炮擊	89
武鬥中那條河邊小路	92
武裝車隊向江北城推進	93
第五章 交槍前後	98
中央調查組來了	98
“八二二”寬銀幕電影院事件	101
陪中央調查組視察江北	104
從黃山帶走朱兆康	107
兩大派停戰、交槍談判	112

妻子隨交槍車隊來了	116
建立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總勤務組	119
令人震驚的“一〇·二七”事件	123
梁興初三次接見	129
軍工“三巨頭”宜賓之行	134
全川“紅十條派”會議與江陵廠火案	138
工總司兩員“大將”遭綁架	141
手榴彈炸毀我的家	146
“一封信運動”與宜賓募捐	148
夭折的永川臥軌大行動	151
第六章 從中央學習班到省革委學習班	153
參加中央學習班	153
使反到底派欣喜若狂的“三一五”指示	154
兩米長的告急電報	157
使八一五派抬起頭來的“四二七”指示	159
推選革委會成員風波	161
夏司令從學習班失蹤	166
我在學習班的“緋聞”	170
在市革委成立大會上受傷	171
在革命委員會“當官”	174
“八一五”會議臨時換人	177
張英才幫我解決奶粉問題	181
青城山上打松鼠	183
“和平綁架”盧班長	186
第七章 “一二·二五”批示前後	190
“土包子”來到京西賓館	190
康生痛罵王茂聚	192
王茂聚自殺與侯振東挨批	194
電梯風波與酒心巧克力	196

周恩來參加重慶組會議	197
作為“保護”對象的小班學員們	200
四川班的大批判與“一對紅”	206
周恩來接見四川班領導小組	208
夫妻重聚淚千行	210
第八章 從準備坐牢到“光榮入黨”	212
進了“四不准”學習班	212
誰知劉福貴是死是活	214
“逼供標兵”要我交待“五大要害”	216
肉麵下藏著一張字條	218
母愛深情	221
魯大東對我的兩點希望	223
“十大宣傳隊”風波	227
參加了一次外事活動	229
并非“突擊”入了黨	232
第九章 在“一元化”領導下搞運動	237
調解委員會	237
到省委學習班學理論	239
“七五·七”會議前後都受氣	244
草草收場的“批派”運動	248
周家瑜訓斥魯大東	251
向市委領導提供“老中青三結合”意見	255
魯大東關照陳萬明入黨問題	258
趙紫陽聽我們當面指責	261
第十章 十年“揭、批、查”	268
開始揭批“四人幫”	268
魯大東的“定心丸”	271
廠廣播站點名風波	273
結束市革委“當官”生涯	277

接受“幫助”趕寫檢查	280
“借”回自己的日記本	283
市委要我限時過關	286
廠清查辦問我兩個“爲什麼”	288
審查終於結束	291
出爾反爾的第二次組織結論	294
第三次組織處理：開除黨籍	296
我爲什麼不出庭作證	303
第十一章 擺脫陰影	307
調資晉級一再被卡	307
公佈了的廠調資文件不作數了	311
我這個老資格的助理技術員	316
“臨危不懼”評職稱	318
終於評上高級工程師	321
痛失愛女	323
又當了一次“調解委員”	332
第十二章 社會承認了我的貢獻	336
發獎金中的一場虛驚	336
當鑒定會發言出現冷場	338
連續獲得先進稱號	340
我到車間畫“斑馬”	342
沒有攻不克的難關	344
清洗劑鑒定遇到意外	345
推廣激光技術與一點個人秘密	349
享受勞模待遇光榮退休	351
後 記	353
附 錄	
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	357

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	360
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司令部（公函）	362
軍工井岡山關於警司“公函”的復函	363
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 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中央首長接見 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五十軍、五十 四軍領導時的講話	365
進入四川省、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的重慶兩大 派群眾組織代表名單	375
文革期間曾在我市支“左”的某部黨委專程 來渝看望受迫害受衝擊的老幹部	382